

花瑶文化
研究丛书

米莉 黄勇军 主编

国家、传统与性别

——现代化进程中花瑶民族的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

米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花瑶文化
研究丛书

米莉 黄勇军 主编

国家、传统与性别

——现代化进程中花瑶民族的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

米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传统与性别：现代化进程中花瑶民族的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 / 米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61-1591-6

I. ①国… II. ①米… III. ①瑶族—民族发展—研究—隆回县
IV. ①K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960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 给 花 瑶

致 谢

首先，我要由衷感谢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张校长以一位改革家的形象和魄力在校园中兴起学术新风，其提携后进之心令人钦佩，正是由于他的慷慨资助，这部持续了八年岁月才最终得以完成的研究成果，幸运地避免了无限期尘封的命运。

其次，我要特别感谢隆回县原县委书记钟义凡。当我们还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远远算不上有分量的学者的时候，时为县长的他就排除众议，坚定地资助了这项学术研究，并由此赋予了我们展开花瑶文化研究的各种机缘。

我要感谢中南大学副校长周科朝、党委副书记高山、人文社科处处长彭忠益在立项阶段给我的批评和建议。感谢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卫良院长、谭希培书记对我的不断支持。在学校和学院工作的三年中，彭昇、颜峰、张金学、陈文联、彭平一、黄永鹏、万琼华、王翔、吴争春、张金荣、刘志刚、罗春梅、李斌、曹升元、刘奇伟等领导和同事都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照顾。

我要感谢湖南师范大学杨小云教授、吴家庆教授、彭定光教授三年来对我的不断支持和鼓励。

我要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杨阳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林存光教授。他们对于这项研究的展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桂琳、丛日云、屈超立、常保国、田为民、梁永佳、应星等几位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高其才教授对我的鼓励和建议。也要感谢考察团成员李严昌、顾旭刚、徐海东、李筠、回楚佳、刘先江、杜联合、余金刚、黄修

裕、范存、廖耀华、谭克松等人的友谊以及与我的讨论。

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郭沂纹女士。她的大力配合使得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我要感谢家人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付出。父亲米如和、母亲薛敏和公公黄佳水、婆婆袁云莲，轮流帮助我们照顾不满两岁的女儿，成为了我最坚强的后盾，使我能够心无旁骛地完成这项研究。感谢在北京工作的妹妹米咪，她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不断地帮我完成从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和借阅书籍的琐事重任。

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先生黄勇军博士。这个项目最初的缘起来自于他与钟义凡县长的几次交流和讨论，是他最终说服县长支持我们展开这项研究。而且，作为我一直以来最好的学术伴侣和知己，他在我们相识相恋以来的十四年中，不断与我展开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讨论，容忍并鼓励我将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落到实处。所以，我的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见解，都应该与他分享。

感谢女儿子牧。她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也开始让我用全新的视角重新看待已然熟悉的世界。她让我的生命充满了不一样的快乐与欢笑。

永远感谢花瑶人。他（她）们愉快地接纳了我，允许我走进并记录他（她）们的生活。这本书理应献给他（她）们。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章 村落视野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

——清末以降的花瑶社会生存状况考察	(10)
一 引言	(10)
二 本章所要考察的内容	(12)
三 区域与村落背景	(15)
四 1911 年以前的花瑶社会	(22)
五 1911—1949 年间国家权力的渗透与该社会的地方传统	(47)
六 1949—1978 年间国家权力的渗透与地方传统的减弱	(58)
七 1979 年以来地方传统的复兴及其原因 ——经济状况、国家政策影响下的花瑶社会	(72)
八 结语	(88)

第二章 边缘的兴起

——花瑶传统的“标准化”努力及尝试	(91)
一 他者：历史与文化的边缘处境	(92)
二 官方的努力：花瑶传统“标准化”的原初动力	(100)
三 矢量互动：花瑶传统的“标准化”进程与结果	(106)
四 谁的传统？——另外一重结果	(135)
五 结语	(140)

第三章 “他者”的“她者”

——花瑶民族的性别、婚姻与权力	(143)
一 奉姐:一个并非传说的故事与“制作历史”	(146)
二 生育的性别偏好与成长环境	(151)
三 婚礼过程与花费:婚姻关系中的力量对比	(160)
四 分家、家庭规模与代际关系	(167)
五 双系制度:性别与权力	(175)
六 奉若华的故事:重新审视国家的“入场” 与传统的“在场”	(182)
七 结语	(192)

第四章 “瘰疬”:花瑶民族的巫术与宗教

一 对“瘰疬”的几点解释与说明	(194)
二 “瘰疬”所产生之社会背景分析	(198)
三 “瘰疬”中所蕴涵的巫术思维分析	(203)
四 “瘰疬”中所包含的宗教成分分析及对“瘰疬” 的性质判断	(207)
五 “瘰疬”在公共领域的作为考察	(213)
六 小结	(217)

参考书目

后记

导 论

一 “传统—现代”纷争与“内部东方主义”的兴起

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延续史的中华帝国而言，晚清以降在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时所遭遇的军事、政治上的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逐渐崩溃，使得一直以自信和孤傲态度示人的中华文明一反常态地陷入了“长久而深远的沮丧和不安”^①。作为对“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回应，知识界开启了“传统—现代”的理论大纷争，在“中—西”、“旧—新”、“落后—进步”、“保守—激进”等带有强烈二元对立色彩的价值比较中，漫长的历史变成了一片空白，多样化的文明被简单化约为“二分式”^②：来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成为更高级文明的代表与中华崛起的救世良药，而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传统”则被无情地打入了故纸堆。

这种文化上的集体性焦虑，在随后而来的政治变革和历届政权转换中均以实际的形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肇始于清末新政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政权建设，其始终如一的着力点就在于不断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以便应对来自西方社会的强大压

①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

② Alejandro Portes：《个人现代性与发展：一个批判》，载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31页。

力，至此之后整个国家被迫进入了一系列“规划的社会变迁”之中。^①而在确立新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习俗，都被意识形态化为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不合理存在，成为“受到压抑的一套残破的规范性知识”。^②

国家强制力的推行和意识形态的渲染，使得民间社会也开始不断反思传统自身。一方面，传统作为历史的遗留物和落后的象征，理应经历不断的改造和抛弃；另一方面，自我生存的本能和惯性，以及它作为一套“地方性知识”在乡土社会的根基性地位，却又令其在与国家权力的交锋中继续以各种方式顽强地重拾过去。可以说，正是在传统与国家的力量交织中，乡土社会在进行并完成着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在此历时久远的时代进程中，当整个中华文明都可以被看作与西方相对立的保持沉默的“他者”，也即萨伊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的时候，植根于中国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差异基础之上的“内部东方主义”^③，也正在悄然兴起。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贯被占据政治、军事优势地位的中华主流文化称之为“夷”，这事实上是一个颇富政治隐喻的词汇，标志着其在文明的等次序列中位居理所当然的下位。另一方面，作为“他者”（与西方相对的中国）中的“他者”（与汉族相对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由于其长久的边缘地带和“夷”之身份，更是被视为对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价值，从而在清末以降历届政府所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不断接受改造的焦点地带和试验前沿。正是在与代表强势文明的外来者的互动中，少数民族开始在聆听外界对他们的言说的同时，不断学习如何为自己发声。

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民族——而言，也

① [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②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王铭铭、[英] 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64 页。

③ 路易莎·沙因：《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内部东方主义》，康宏锦译，马元曦校，载马元曦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01—102 页。

无时无刻不处于这几种彼此交汇的情景之中。在席卷整个国家的关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身处地域和文化双重边缘地带的他们，正在被视为“边缘”的“边缘”和“他者”中的“他者”，在传统的现代变革中备受磨砺与熬煎。而“现代—传统”在各个领域的不断纷争与“内部东方主义”兴起过程中的权力较量，既构成了花瑶民族生存的元场域，也构成了本书得以展开的理论和文化背景。

二 选择花瑶民族作为调查区域的理由

笔者之所以选择花瑶社会作为调查区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在现有的各类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考察的文章与著作中，包括海外汉学家的著作在内，其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华北农村与东南沿海以及福建等地的汉人社区，^①但对地处中国内地中部的湖湘地区的社会状况缺乏充分的研究，至于该地山区的乡村社会状况，则更是鲜有论述。花瑶民族居住在典型的山区，其地情、地貌、气候以及交通方式、交往形式等都与华北平原和东南、福建沿海地区以及江南水乡完全不同，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着该区域不同于其他地区乡村社会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宗族势力、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形成。对于这样一个山区社会的调查，无疑将会成为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补充。

其次，花瑶民族经历了由四处迁徙到最终过上定居生活的过程，民族迁徙的记忆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理、思维、习惯以及传统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一记忆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前人研

① 这些著作如[美]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美]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铭铭的《村落视眼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有诸多学者将关注点集中在这些区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区域的原始调查资料非常丰富，足够开展学理上的分析与探讨。

究的许多相关资料和花瑶同胞自己收藏的族谱都能证明,直到明代,他们才逐渐迁居到现在所居住的隆回、溆浦一带,过上了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生活。^①对这样一支经历了由迁徙到定居,而且深受迁徙记忆影响的特殊民族一百多年以来的生存状况进行考察,无疑将会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最后,花瑶民族是被大众所遗忘的一个群体,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以一种鲜为人知的独立姿态生存于世,坚持着自己古老的风俗、习惯、传说、禁忌、语言,等等。然而,在近一百多年来,同其他民族和地区一样,花瑶社会也在发生着许多不曾预见到的重大变化,并日益登上了当地民族文化产业的前台,以文化明星的身份颠覆着旧的历史影像。对这样一支曾经封闭、原始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史的考察,有可能会揭示一些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考虑之外,我们调查花瑶社会还有一些特殊的便利条件。花瑶主要居住在隆回县小沙江地区,而我们考察团的成员黄勇军就是小沙江镇人,他在读小学之前一直居住在老家,其家对面就是两个相当封闭的瑶寨(奉家院子、葵花子冲),所以自小就与花瑶有着较多的

^① 有关花瑶民族的族源以及迁徙路线,在花瑶民族民间收藏和流传的记录其历史的手抄本《雪峰瑶族诏文》和清咸丰元年(1851)《奉氏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花瑶沈、奉、蒲、刘、步、回、严、兰、丁、唐、杨、梅各姓祖先,元代居住在江西吉安府,在徐寿辉天启元年(1358)遭到官府赵、鲁二督统领兵驱赶杀戮,逃离吉安府,向广西、云南、贵州迁徙。自明洪武元年,“始迁湖南洪江,嗣是又家龙潭”。《奉氏族谱》载:奉姓五房始祖“明洪武时由洪江徙居辰州龙潭”,其妻易氏,随二子褒士隆、褒士堂由龙潭迁居隆回县虎形山的歇官寨和金竹坪,他们便是隆回花瑶的始祖。此后,沈、唐、刘、杨、蒲等各姓陆续迁入,居住于麻塘山、青山、杉木坪一带,再渐渐向虎形山、茅坳一带移居。经过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发展成现在有六千四百多人的世居少数民族。(参见马道明、谢元华《隆回县志·民族篇》(送审稿),第6—7页。)关于花瑶民族具体的迁移路线,学界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如1997年版的《邵阳市志》中认为:“今隆回小沙江一带自古为梅山峒地,据奉姓、沈姓等族谱记载,奉、沈、蒲、刘、步、回、丁等姓花瑶,元代因受统治者的歧视和征讨,被迫离开世居的江西吉安田庐,西迁贵州,后又辗转广西桂林一带,元末再从桂林从北徙,经义宁、城步迁至今湘西南的洪江。明太祖年间,从洪江迁居溆浦龙潭等地,以后更向深山密林徙进,插标为记,相继定居在今隆回县西北的麻塘山、小沙江、龙坪、虎形山、茅坳等地和今洞口县大屋瑶族乡和桐山一带。”(参见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邵阳市志》,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但是普遍的共识是,他们是在明代左右迁徙到现在所居之地的。

接触。我们对花瑶的许多初步了解就是从他那得来的。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祖父黄武魁（瑶山的人称其为“魁爷”）与奉家院子的花瑶兄弟曾结拜为兄弟，并且因为武艺高强、为人正直而在整个瑶山中间享有盛誉。他的父亲黄佳水也与瑶族以兄弟相称，而且，由于工作的缘故，他还必须经常与花瑶打交道，这使他在瑶族同胞中有着极其广泛的人缘。这样的关系网有助于我们拉近与被调查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他们的戒备心与疏离感，为调查的尽快展开创造了一个极好的便利条件。实际上，在调查期间，我们也常常受惠于这样的关系网络：花瑶同胞对我们极其信任，愿意与我们进行诚恳的、推心置腹的交谈，并且把不会轻易示人的族谱展示给我们看，甚至还允许我们亲自参与体验了他们神秘的宗教仪式——“瘰皈”的过程。这一关系网络使得我们能够在调查刚开始就进入到他们民族的内部，接触到他们文化与生活的核心。而且，在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还能够经常地从他的父亲和亲戚那里听到有关花瑶的情况，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调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三 田野与方法

我们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虎形山瑶族自治县和小沙江镇。虎形山瑶族自治县是花瑶聚居之地，1956年9月建乡，并于1995年合并了同为瑶族乡的茅坳瑶族乡，是全县唯一一个瑶族乡。^①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当时该乡花瑶人口达到5272人，占全县瑶族人口的82.71%以上。^②而对小沙江镇散居的几个花瑶村落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比较聚居区和散居区的花瑶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及其应对不同的国家政策所作出的反应是否有所不同，等等。另外，麻塘山乡和大水田

① 马道明、谢元华：《隆回县志·民族篇》（送审稿），第2—3页。

②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乡也有少量花瑶居住。^① 我们对麻塘山乡的部分地区也进行了考察，并把考察情况作为补充资料予以列出。对大水田乡则没有涉足，除了考虑到人数较少之外，还因为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所有人（包括花瑶同胞）都认为，该地的花瑶已经基本上被汉化了，没有考察的必要。

在正式的田野调查展开之前，我们曾经与花瑶有过数次短暂的接触。在2003年4月至7月期间，由于“非典”的缘故，笔者与黄勇军一同在他的家乡小沙江镇居住了三个多月。在这段难得的空闲日子里，我们与花瑶同胞有过一些面对面的接触，并参与了他们盛大的民族节日——“讨僚皈”，仔细地观察过他们在重大节日中的表现与作为，听到过一些与他们有关的故事以及附近汉人对他们的认识和描述。这些背景构成了我们开展其后历次田野调查活动的前提，有助于我们制定出较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查计划。

我们的田野调查时间跨度很长，在八年的时光中总共可以分为比较正式的三次和多次随机的访谈。第一次正式的调查是在2004年7月底至10月底之间进行的。除了过年之外，这段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为重要的，刚好包括了他们最为繁忙的收割季节和三次最为盛大的民族节日。在与花瑶人同吃同住的三个月里，我们获得了对他们的直接、具体而生动的感性认识，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因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还有许多是他们从来不肯轻易示人的。第二次正式的田野调查集中在2005年6月至7月，在方法上依旧采取的是亲身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法。第三次正式的调查集中在2011年11月底至12月底，时隔七年之后，瑶山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而时光的推移足以让这种变化以显见的方式积淀下来。

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几次不那么正式的回访，时间分别为2008年7月中旬，历时十天；2012年6月中旬，历时一周。采用的是半结构式的访谈，补充了正式访谈后出现的疑点和不足。除此之外，在酝酿和写作的过程中，笔者还经常性地与他们进行联系，由于前期我们之间已经

^①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数据分别为146人和214人。

建立了十分良性的互动关系和友谊，受访的花瑶人都非常乐意并直接地回答笔者的问题。因此，本书是在花瑶人的口述资料、笔者的田野观察记录和文字资料参考下共同呈现的。

四 主要内容

晚清以降，席卷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将身处“地域—文化”双重边缘地带的花瑶民族也卷入了这一宏大叙事的洪流之中。作为“边缘”的“边缘”和“他者”中的“他者”，他们在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备受磨砺与熬煎。国家权力、地方传统、政府权力、资本市场、政治精英、普通民众、社会性别……各方矢量交织互动，重新解释、定义、凝练、剥离、建构、塑造着花瑶的文化传统，共同推动其社会发展、制度变迁的基本走向与最终命运。

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分如下四个专题展开。

第一章《村落视野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清末以降的花瑶社会生存状况考察》，从国家权力的控制力与地方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入手，系统考察了在清朝末期、民国年间、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这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内，控制与主宰花瑶社会的权力体系的逐步变迁与演化过程。在这一百多年里，这两股力量主要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国家权力：（1911年以前）弱—（1911—1949年间）与宗族权力结合，并加大渗透力度—（1949—1978年间）增强而不独占—（1979年以来）与地方传统相结合；

地方传统：（1911年以前）强—（1911—1949年间）与国家权力结合，但仍占主要地位—（1949—1978年间）短暂的空白与断裂—（1979年以来）传统之复兴。

可以说，在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面对着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与侵入，地方传统并没有全面瓦解和消失，而是依然在花瑶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文明延续的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第二章《边缘的兴起——花瑶传统的“标准化”努力及尝试》应当被看作是对上一专题的延伸讨论。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和雄宏野心，将地处边陲的花瑶民族也卷入了这一宏大叙事的洪流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举措，从客观上改变了花瑶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他们曾在历史上饱受主流文化所诟病的“边缘化”和“另类化”特征，却在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开始全面推行的旅游开发措施中，一反常态地成为了花瑶民族从周边汉族中逐渐兴起的历史和文化筹码，推动其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巨大身份转换。对于花瑶民族而言，边缘的兴起既非一个强制性的过程，也并非任何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反而是一个容纳了多重主体的“计划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其中，国家、政府、资本、民族、社会、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几股矢量交织互动，在带着对未来愿景的美好憧憬中，共同参与、协商、主宰和推动着花瑶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花瑶传统在不断的变革与调试中，最终作为官方、外界、自身都能认可和接受的形态而存在的“标准化”历程。

第三章《“他者”的“她者”——花瑶民族的性别、婚姻与权力》改写了花瑶民族研究中性别研究的缺席状态。文章始于一个女性（奉姐）的故事，终于另一个女性（奉若华）的故事，并贯穿了关于性别和婚姻、权力的各种讨论。奉姐的传说，塑造着他们理想中的女性形象与家庭生存状况，然而，现实中花瑶民族的性别、婚姻与权力，却与这一理想有着诸多不同之处。生育的性别偏好，在更加青睐男性的同时，并未造成对女孩更加不利的出生选择和生存境况，相反，两性都能在家中获得几乎平等的抚养和对待。而作为嫁方的女方和作为娶方的男方在婚礼花费上的悬殊对比，昭示着男性在婚姻问题上比女性而言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并影响着家庭结构的格局与权力分配。对于“母亲中心家庭”的向往，使得女性更加积极主动地促进分家的进程，并实现了家庭的小规模化，同时还以更加主动的方式影响着代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变化。作为结果，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形成了与男性权力平行的“双系制度”，从而与更多地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与

此同时，奉若华的例子则向我们表明，国家和作为女性的个人是如何通过相互间的合作与互助，最终实现了前者的“入场”与后者的“赋权”。然而，也绝不当忽视传统与父权制依旧存在的影响力，他们正在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与国家的力量一同决定着女性的权力走向。

第四章《“瘰疬”：花瑶民族的巫术与宗教》，对于花瑶人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带有强烈原始色彩的巫术—宗教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巫术性质和其中所内含的宗教成分以及在公共领域的作为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原因所在。自古以来，花瑶民族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到足以抗衡中央政权的势力，也没有形成一个坚定的政治和宗教、文化核心。对于他们来说，汉族文明一直是一个强势文明，在这个强势文明的长久压力与包围之下，他们时刻面临着被迫或自愿放弃自己本民族的某些传统，而被这种更高的文明所吸纳或者同化的风险。但在所有的花瑶传统中，瘰疬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卷入彻底市场化进程并进行商业运作的领域。其中原委，自然与其本身的神圣性难以被市场化和世俗化有着直接的关联。避免了其神圣性被娱乐化运作的风险的瘰疬，在这种文化的夹缝中获得了生存的空间。然而吊诡的是，标准化、历史化、文化化、遗产化、正式化了的瘰疬，同时也在更多的普通人中间失去了学习和传承的吸引力和驱动力，无法消解逐渐失传的风险。萎缩之后，便是永远的历史绝响。